

## 芝秀堂本《古今注》版本考

孔庆茂

**摘要:**芝秀堂刻本《古今注》，张元济、陶湘都亲自鉴定著录为宋刻本，且分别收入相关的丛书内。但今人却著为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翻刻本，并没有提出相关令人信服的证据。兹以原刻本鉴定，发现芝秀堂原刻部分与后补刻的部分，版框不同，字体不同，墨色浓淡不同，书版磨损程度有很大差异，两者不是同一时代的书版，断定为宋刻明印本。

**关键词:**芝秀堂；古今注；版本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3-0050-02

晋崔豹《古今注》三卷，存世较早的版本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吴琯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这些都是明代丛书本，单行本有芝秀堂刻本。

芝秀堂刻本半页10行，行15字，字大行疏，有明显的宋刻本的特点。书后有宋李焘、丁黼两跋，丁跋标明重刻于嘉定庚辰（十三年）四月。除了其中四叶系明显的抄补之外，其他都保持宋刻本的原貌。关于芝秀堂刻本的版本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宋刻本，近代著名版本学家张元济、陶湘皆断为宋刻本，张氏涵芬楼《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影印该书，即标明“宋刊本”，并将此本与其他明刻本作了比较，写下了详细的校勘记附于后。陶湘《百川书屋丛书》第一种即影印此本，亦标明据宋嘉定刻本影印。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正德、嘉靖间的“覆宋刻本”。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说：“正、嘉间芝秀堂覆宋本《古今注》，因为嘉定庚辰四月望日东徐丁黼题识，陶湘涉园《百川书屋丛书》、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时都以这个本子为底本，可是两家都著录为宋本”（见魏隐儒、王金雨编《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可能受魏隐儒先生的影响，天津图书馆在此书下迳著为“明芝秀堂刻本”（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尚有可商榷之处。

查芝秀堂刻本《古今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只有天津图书馆藏孤本，系袁克文、周叔弢旧藏，后归天津图书馆。此书的确流传极少，张氏、陶氏影印即以天图本为底本。笔者所藏一本，与天图本款式完全相同，经过仔细反复对比考证，笔者认为，二者应为同一版本系统，芝秀堂本《古今注》当是宋刻明补印的本子，而不是明刻本或明覆刻本，考证如次：

前文所提到的有关芝秀堂本《古今注》为明刻本

或明覆刻本的说法没有提出明确的版本鉴定的依据。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首先要辨明芝秀堂是什么时间的刻书堂号，芝秀堂是不是明代的刻书堂号？如果能证明是明代刻书堂号，那就肯定是明刻本无疑。但现存或书目文献著录的明刻本中，都找不到芝秀堂这个刻书堂名，没有任何其所刻书的记录。宋刻本因时代久远，流传极少，找不到其他旁证，是很可能的。如果说明代正、嘉间的刻书堂号，能“覆刻”到乱真的地步，到现在却找不到任何刻书的记录，就很让人生疑了。魏隐儒先生断定为“正嘉间芝秀堂刻本”，但没有列出其证据。另有一篇未署名的《论古书做伪的手段》引了魏先生的话，并根据自己的想法有所补充：“明正嘉间芝秀堂覆刻宋嘉定本晋崔豹的《古今注》三卷，半页十行，每行十五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下刻‘芝秀堂’三字，由于书贾把‘芝秀堂’字样挖掉了，因此，涵芬楼《四部丛刊》、涉园《百川书屋丛书》影印时，都以这个明覆宋本为底本，而皆著录为‘依宋影印’。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大名鼎鼎的张元济先生也未识其伪，可见其摹仿之逼真”。

就笔者所藏的本子与《四部丛刊》、《百川书屋丛书》本相对比，在尺寸、行款、字体、版式、墨色浓淡上完全一致，又比影印本更清晰地看出版刻的痕迹，可以清晰地看出原版“芝秀堂”字样并没有被挖改。

从纸张与墨色上看，这本《古今注》是明代正嘉间印的，印书用的是细薄而柔韧的白棉纸，但据此就认为是明代的覆宋刻本是缺乏证据的。我看到的原本及影印本，并不像上文所说的被书贾挖去了“芝秀堂”三字冒充宋刻本，恰恰相反，原刻的大部分的书口下面，都保留着此三字，只有手写补刻的四叶没有此三字。

持这种观点的人所说的“书贾”指什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刻书者，二是卖书者，第三亦有可能是后人挖改旧版重印作伪。首先说第一种情况，如果是“明代”芝秀堂覆宋刻的话，那么全书的版框、版

**收稿日期:** 2007-04-09

**作者简介:** 孔庆茂（1964—），河南济源人，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学。

式，字体及刀工，应当是一致的，从前到后应当是一种风格（因为部头很小，只有一个刻工“李森”），总不至于大相径庭，判若两人。况且，从前到后应当都有“芝秀堂”三字；当然如果芝秀堂欲存心作伪牟利的话，就应当不标其堂号。总不至于有标有不标吧。此说不能自圆其说。再说第二种情况，如果说这里的书贾是指卖书人，那么他只可能在书口上做文章，挖掉书口重新修补，但这种做法瞒不过明眼人，况且只能就一本书作伪，不可能同时把张元济、陶湘以及其他人所藏的本子都挖改作伪。书贾要冒充宋本，就必须把堂号全部挖掉。可见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第三种可能是上文作者所没有想到的，芝秀堂是宋代堂号，明代人用旧版覆刻，造成原刻有堂号，补版没有。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覆刻，版框、字体应当前后一致的，而这本中补刻部分不论字体、版式、版框还是墨色浓淡深浅，都与原刻部分明显不同。

假如是覆宋刻本，那应该是全书按照一个版式，相同的版框与字体，完全照宋刻本影刻。即使宋刻本有不全，既然刻书者能照宋版一字不少地补录，当是见到过完整的宋刻，也就能一字不差的覆刻。芝秀堂本与明刻其他本子有很大差别，篇目多寡不同，顺序不同，文字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张元济先生每篇都做了详尽的校勘，校记几与原书等。我查过不同的版本，如果没有宋刻，用其他诸明刻本是无法一字不差地补所缺四叶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完全照宋版覆刻呢？而且，为什么覆宋刻本，原刻与补刻的部分字体与刻工风格迥异呢？原刻用宋代常见的柳体，字体筋骨瘦硬，眉目疏朗，而补刻是手写上版的，字体松软肥厚。原刻的部分书口下有“芝秀堂”三字，补刻的没有，即使退一步说书贾把补刻部分的“芝秀堂”三字挖改，因为字体刻工的风格完全不同，相差太大，不仅不能蒙骗别人，反而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张元济先生为芝秀堂本作了一篇长跋，力辩此书非明覆宋本。他引多种明刻或明覆宋本证明。云：“昔黄堯圃尝得一明刻，谓李注《文选》沈休文诗‘宾阶绿前满’句，引是书曰：‘空室无人行，则生苔藓，或青或紫，一名绿钱。今检此本无之，则此书之失多矣。’余案：是本卷下第四叶明有此条，黄氏所见为明覆宋刻，余尝取顾氏文房、古今逸史、汉魏丛书数本勘之，所言诚然。其他如鸟兽类‘马自识其驹’一节，‘猪一名长喙参军’一节，明本亦皆阙佚，其章节次第文字

详略尤多不同。顾氏自记以家藏宋本刊行，何以有此差异？又其鱼虫类蜗牛、魃子二节，文字较此为详，

《埤雅》《尔雅翼》亦均引之，疑必出于别本。然综观全书，则不逮是本远甚。”下又引数例“以见先后版本之别，且可定其优劣焉”。张元济以芝秀堂本与顾氏文房本、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诸明本对照，仅篇目而言，上卷多出4节，中卷多出1节，下卷多出7节，至于篇中文字的歧异就更多了。因此张元济定芝秀堂本为宋版原貌，其他明刻或明覆刻本为晚出。张先生主要是从内容上对比得出结论的。

如果仔细比较此书的原刻与补刻部分，也可以从版刻上补充张先生的论断。芝秀堂本原刻与补刻版是不同时代的。补刻的正文与书口都是肥厚的手写体，原刻部分的正文与书口字体，都是风格相同的柳体，看来没有丝毫存心作伪的痕迹。体现在刻工的刀法上，亦不相同。原刻刀工刚劲有力，棱角突出，转折处皆方，补刻部分刀口松软无力，远逊原刻。原刻的版框稍小，边框较细，且多断裂、墨色枯淡不匀；补刻版框较大，边框较粗，墨色较浓，着墨非常均匀。明显地原刻版在前，书版纹理较粗，印得较多，磨损严重，有些地方有明显朽蚀断版之处；补刻在后，印版纹理细，磨损很小，印版成色很新。

经过对两部分仔细的鉴别，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原刻与手写补刻部分，不是同时所刻，字体不同，刀工不同；2、四叶补刻的部分均字迹清晰，墨色浓淡均匀，版框较粗，毫无模糊不清之处。原刻部分，字迹或浓或淡，常有断版与湮漫不清之处。3、原刻的时代在前，补刻的时代在后，即在明代正德、嘉靖时期。4、原刻标有“芝秀堂”三字，补刻则无。故可以肯定，芝秀堂不是正嘉时期的刻书堂号，而当是南宋嘉定时的刻书堂号，补刻的部分则刻于正嘉间。《古今注》卷帙很小，版刻易于保存，盖原版流传至明代，有四块缺版或残损严重，故当时就其所缺，补刻四叶，重新刷印。故一书有版刻新旧之别。补刻者并无意作伪，所以只用风格迥异的手写字体上版，书口也不加原刻堂号。古籍中宋刻明修明印的书非常多，不细心考察，很容易误为覆刻本。考嘉定十三年丁丑尚刻有《风俗通义》，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卷5至卷10，嘉定十五年刻《逸周书》，今原版不存，此《古今注》殆因卷数少，故书版能传至明代。又《古籍宋元刊工索引》著录有此书刻工李森，亦可为一个佐证。

## The research on the edition of the Zhixiutang's block-printed book *GuJinZhu*

KONG Qing-mao

(School of Ar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8,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Zhixiutang's block-printed edition *GuJinZhu*, which had been authenticated by Zhang Yuanji and Taoxiang in Qing Dynasty, labeled it Song's block-printed edition, and was embodied in the correlative series books. But now it was labled inaccurate as reprinted edition of Zhengde and Jiajing ages in Ming Dynasty, and they had no compellent evidence. Through authenticated the Original edition, I found there was some different between the original block-printed edition and the subsequently edition in format, style and the shade of style. And there is also very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abrasion, they were not the same age edition. This proved that the Zhang Yuanji and Taoxiang's lable is right.

**Key words:** Zhixiutang; *GuJinZhu*; Edition

(责任编辑: 闫丽)